

历史长河中的“幸福观”

熊月之

央视近期关于“你幸福吗”的一组调查，引发热议。人们听到了五花八门的回答，有人说“很幸福”，有人说“不幸福”，有人说“不清楚”，还有人没有听清问题就做出无厘头的回答，被戏称为“神回答”，为这组报道增添了一些喜感。

幸福究竟是什么？历史长河中的“幸福观”又是怎样的？《解放周末》特约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包含哪些内容？如何获得幸福？在同样境况下，为什么有人觉得幸福，有人不觉得幸福，甚至觉得不幸福？在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少人的幸福感没有同步增长，甚至还有所下降？古往今来，中外学人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繁复的解读与讨论，而且还会继续讨论下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解读、讨论这个问题的，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幸福这个概念原本就是一道谜题，是永久的纷争之源，是一摊水，能被塑造成各种形态，却没有任何形态能使之枯竭

对于幸福，学术界迄今没有一致公认的定义。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幸福这个概念原本就是一道谜题，是永久的纷争之源，是一摊水，能被塑造成各种形态，却没有任何形态能使之枯竭。幸福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冥想，是灵性也是理性，是愿景也是结局，是德行也是罪恶。”

据说在奥古斯丁时代，即公元4世纪，欧洲已有至少289种幸福定义。18世纪，已有约50篇专门讨论幸福问题的长篇论著。那以后，又不知增添了多少种定义，新出了多少部论著，幸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正因为幸福涵义的含混性、多义性，所以，许多研究幸福的论著在一开始都要对自己所说的“幸福”有个界定，并强调那是许多定义中的一种。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说：“由行动中可以得到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不论是贩夫走卒或是文人雅士都认为是幸福。但是不同人所说的幸福是不同的。”近代的康德说，幸福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幸福，然而，他永远都不能明确地一贯地说出他真正希望和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现代的弗洛伊德说，幸福基本上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今人无法推测古代划船的奴隶、宗教法庭的牺牲者、待被屠杀的犹太人，他们是快乐还是痛苦。

对于幸福，新版《辞海》的解释是：“人们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预定目标和理想时感到满足的状况和体验。对幸福涵义的理解因理想、追求的内容不同而有不同。”这一解释要旨有三：一是幸福的本质是综合的，既是一种客观生活状态，也是一种主观心理体验；二是幸福的表现是多样的，既体现在预定目标和理想实现时，也体现在为目标与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三是幸福的具体内容是多元的，因理想、追求的内容不同而有不同。这一解释，既有确定的内涵，又有很大的包容性、开放性，可以覆盖历史上多种流派对幸福的定义，也可以涵盖当代不同学科对幸福的定义。

中国传统的四类幸福观，构成了数千年来中国人追求幸福的弹性空间，影响着不同的人群。在中文词汇中，幸、福两个字连用作为今人所说的“幸福”，那是很晚的事。在古人那里，用得比较多的是“福”与“乐”。“福”字在甲骨文中，原是祭祀之意，表达人们的祈望和要求，字面的涵义是，两手捧着盛酒的器皿贡献在祭台上。

古代中国最早较为系统论述幸福问题的，是春秋中叶以前的《尚书·洪范》。文中记述西周初年武王访问殷逸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为武王陈述了治理天下之九条大法，其第九条是

“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所谓“五福”，指寿、富、康宁、攸好德（爱好美德）、考终命（善终）；所谓“六极”，指人生不幸的六种表现，包括不得好死、多病、忧愁、贫穷、貌状丑恶、志力懦弱。由此可见，其时人们的幸福观，以生命质量为核心，长寿、康宁、善终都是生命质量的具体表现，富有是生命质量的物质保障，爱好美德能达至人事和谐，这也是美好生命质量的必要条件。到了汉代，桓谭在《新论》一书中，又增加了关于子孙的内容：“五福：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儒家重视宗族的延续，所以特别将“子孙众多”列入幸福范围。

儒家很少直接讨论幸福问题，其幸福观主要体现在关于人生理想的论述当中，其特点一是精神层面的快乐重于物质享受，二是社会幸福重于个人幸福。

孔子是对于物质享受与精神快乐两相兼顾的人，但更重视后者。他的学生颜回，日子过得很苦，但是道德高尚，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对这种幸福观极为赞许。孔子将“仁”即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关系，作为人生理想核心。他赋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人许多美德，诸如克己、公正、谦恭好学等，希望人们以这些圣贤为楷模，向内则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向外则积极进取，齐家、治国、平天下。

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把仁、义结合起来，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这些善端扩而充之，就发展成仁、义、礼、智四种美德。人通过“思诚”即反省自身，达到至诚的境界，通过“养气”即养成谨守道义、凡事不动心的浩然之气，就可以达至幸福境界。

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通过“化性起伪”的方法，改变、矫正人之恶的本性，发展善性，从而达至幸福。在他看来，人之初，性本恶，优秀品质是后天教育和环境影响造成的。在处理满足物欲与道德修养的关系问题上，他主张节制欲望与引导欲望。他认为，人的自然欲望不能完全根除，也不能完全满足，但可以通过理智来调节。

儒家的幸福观，重视理性与道德的作用，强调没有理智和美德就不会有幸福，强调社会幸福重于个人幸福，这在人类幸福思想史上有其特别的价值。但是，这种幸福观，忽视人的本能欲望与物质生活，把理智与情欲对立起来，把物质享受与道德修养对立起来，发展到极端，就是禁欲主义。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就发端于此。

道家学派的理想幸福人生，与儒家很不一样。老庄崇尚回归自然，逃避尘世，过原始质朴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

老子主张，圣人以“无为”为事，一切顺其自然，去智绝欲，过自然的生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那样就会天下大治，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他认为，要达到无为境界，就要守弱。坚强有害，柔弱有益，柔弱能胜刚强。天下之柔莫过于水，然攻坚强者亦以水为最。在欲望满足、幸福与道德的关系上，老子主张寡欲，要求人们把欲望降到最低限度。

庄子提出理想人生的下列标准：一是无情，即不动感情，心境平和，不为喜怒哀乐所困扰，不以好恶而伤身。老婆死了，不但不哭，还鼓盆而歌；二是无己，即逍遥游境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牵无挂，“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既不考虑自己，不追求功绩，也不追求名誉；三是无所待，他说，至人并不凭借别的东西，而是凭借天地之正气，在宇宙中遨游，所以无所依傍与企求；四是无用，要把自己当成一块废料，没有任何实际用处。他以山中树木为例，那些干直、质好的有用之材，早被人砍去盖房子、做家具了，但那看上去毫无用处的散木，用来造船则沉于水，用来做棺材则腐于土，用来做门窗则脂液不干，用来做柱子则易受虫蚀，这类树木却活了几千年。他说，“树不成材，方可免祸；人不成才，亦可保身。”一般人能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无用反有大用，这就是保存自己、享受逍遥游的幸福生活。

道家的幸福观，忽视甚至否定了人力的意义，否定道德的重要性，是安命顺性的天福观，是一种消极幸福观。但它主张对物质财富、生死寿夭、贵贱达穷、外在环境都持淡泊态度，注重心灵的沉静，关注那些符合人之本性的、内心的幸福，这在拓展人的心灵空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方面，有其特别的价值。

幸福的反面是不幸福，包括不幸、痛苦等。人们如果能摆脱不幸、祛除痛苦，那也就离幸福不远了。在中国传统幸福观中，佛教在这方面建树最大。佛教的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观念，长期在社会上流传，深入民间，对中国人的幸福观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济公传》里许多故事，说的都是因果报应。

在中国传统幸福观中，还有一条潜流，即物欲享受幸福观，或曰享乐主义。

西晋鲁褒，著《钱神论》，通过司空公子与慕母先生两个虚拟人物的对话，讽刺为官从政唯钱是尚的社会风气。内称：钱的功能，极为神奇，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有了钱，可以无德而尊，无势而热，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文中对于崇拜金钱的世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同样写于晋代的《列子·杨朱》篇，含有相当系统的享乐主义。文章宣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享乐：人生世上，十年也是死，百年也是死，成仁圣也是死，为凶愚也是死。无论是尧舜还是桀纣，死了都同样是一堆腐骨。什么高的官位、美的名声、长的寿命，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有物欲享受才是最实在的。太古之人知道生命之短暂，因此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该享乐时就享乐；从性而游，该放纵时便放纵。他宣称，人生的快乐，就是“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这是典型的享乐主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像《钱神论》、《杨朱》篇透露出来的这样的享乐主义思想并不多见。这是因为，在重义轻利主流价值观的笼罩下，读书人即使有享乐主义思想，也不会轻易将其表露出来。但是，这一潜流还是若明若暗地显露出来。中国民间一直对财神礼敬有加。中国何时开始有财神崇拜，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在明代出版的《封神演义》中，赵公明已是财神了，其封号是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职责是“专司金银财宝，迎祥纳福”。明清时期，中国各地普遍信奉财神。清代道光年间顾铁卿所作《清嘉录》中，有竹枝词记苏州人迎财神情形：“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抢路头”意为抢在别人前面接到财神。在读书人那里，对钱财的重视源远流长。孔子学生子贡就是做生意的好手。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也很会理财，在许多地方垦田，学问做得很好，也不差钱。清代学者钱泳说过一段话，很能代表读书人重视钱财的心态：“银钱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则难于运用，少则难于进取。盖运用要萦心，进取亦要萦心，从此一生劳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随之衰惫。须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撙节以经理之，则绰绰然有余矣”。他说的是“不多不少”，看上去很中庸，其实他强调的是不可少。

在中国传统幸福观中，儒家倡导的是精神重于物质、社会高于个人的刚健有为的幸福观，道家开辟的是消极无为的免灾避祸之路，佛家提倡的是弃绝物欲的遁世之路，杨朱等人主张的是顺性纵欲的享乐主义。这四类观念差异很大，构成了数千年来中国人追求幸福的弹性很大的空间，影响着不同的人群。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明有一部分人是以物欲为价值指向的。儒、道两家也刚柔相济，互为补充，达则兼济天下，谋求天下福祉，穷则独善其身，寻求个人安身之地。从陶渊明、苏东坡、袁宏道等人的生命历程，都可以看出这两种幸福观的交互影响。

对于幸福问题，西方思想家也有相当丰富的研究

西方思想界有讨论幸福问题的悠久传统，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就思想脉络而言，除了基督教神学幸福观之外，学术界一般将其分为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两类。

理性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古代有赫拉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近代有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这些人幸福观的共性是认为人的幸福必须在理性指导下才能实现，强调人的精神快乐和理性能力，主张抑制欲望，追求道德完善。这类似于儒家的德行幸福感。赫拉克里特有句名言：“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苏格拉底有个关于幸福的等式，即理性 = 美德 = 幸福。斯宾诺莎认为，幸福不是别的什么，而就是德性本身。康德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感性欲望，而在于理性，但人绝不能将理性用作满足感性需求的

工具，理性有其更高的用途，即要考察行为动机的为善或为恶，强调是动机而不是效果决定行为的善恶。他认为，幸福存在于至善之中。

感性主义流派代表人物古代有德谟克利特、亚里斯提卜、伊壁鸠鲁等，近代有霍布斯、爱尔维修、边沁等。这一派幸福观的共同点，在于把趋乐避苦当作人的本性，认为幸福就是追求感官的快乐、避免感官的痛苦。亚里斯提卜认为，肉体的快乐比精神的快乐更迫切、更强烈，肉体的快乐优于精神的快乐；而且，肉体的快乐既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只在眼前。这类似于杨朱的享乐主义。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虽然强调感官快乐对于幸福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要求人们追求精神快乐。边沁把感性主义幸福观发展为功利主义幸福观，提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命题，并认为人的幸福程度是可以评价与度量的，只要了解一个人的痛苦与快乐的程度，就可以计算出他的幸福程度。他还提出了计算和评价幸福程度的要素，包括感受苦与乐的强度大小、时间长短、是否确实以及确实的程度、影响范围等七个方面。这开启了后世对于幸福感指数研究的先河。

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以后，幸福问题更加为欧美世界所重视。美国将幸福问题写进了《独立宣言》，将其与生命、自由并列，宣称那是不言自明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弗洛伊德，都对幸福问题有丰富的论述。马克思充分肯定人的正常需要，包括满足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认为幸福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享受与劳动的统一，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只有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

弗洛伊德从分析人的本能出发，认为人们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和保持幸福，这种幸福遵循快乐原则，是高度压抑的需要的满足，最好是突然间得到满足。这种幸福，从本质上说，只能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人类的生存状况使得快乐的无限欲望与痛苦的无限可能结伴而来。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幸福，是人类痛苦和不幸的根源。他认为，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我们的身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消亡；二是来自外部自然世界，它可能以强大而无情的力量对人类施虐；三是来自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归结起来，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对于身体的衰老与消亡，那是自然规律，不足让人悲观。但人与自然，与他人关系的紧张，是威胁人幸福的根源。对于这些威胁，人类开不出什么良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世界对于幸福问题的研究，更为多样。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与哲学领域，都有很多十分专业的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理查·莱亚德（Richard Layard）在其所著的《不幸福的经济学》中，称“幸福是一门新学科”。他称影响幸福程度的有七大因素，即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这里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心理学界、社会学界偏重于从心理感受、体验方面研究幸福，对于幸福，倾向于用合成词 subjective well-being，直译就是“主观幸福感”。影响极其广泛、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幸福指数，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设计出来的。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与幸福层次论，对幸福观研究有重要价值。

对于幸福问题，中外思想家都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涉及幸福的定义、幸福的本质、幸福产生的条件、获致幸福的路径、物欲享受与精神快乐、积极幸福与消极幸福、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幸福与道德、幸福与痛苦、幸福的觉解与度量等诸多问题，议题极为广泛，很多见解与讨论对于今人如何看待幸福问题，大有裨益。